

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质及其时代弘扬

吴潜涛 沈茹毅

内容提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正确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本质属性,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前提,也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依据。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创建实践的客观反映,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生革命实践的反映,集中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最终目标和行动纲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形态,伟大建党精神是对党创建过程中不同时期形成的精神形态的高度概括和凝练,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认识把握的理论升华和智慧结晶。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质,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就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为榜样,把广大党员个体锤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保持党员队伍活力;就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中,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和恢宏视野来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伟大建党精神 时代弘扬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认为,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同时,意识又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是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法。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发生,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8 页,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第 18 页,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

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伟大建党精神属于意识和观念的范畴，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创建实践的客观反映，集中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最终目标和行动纲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生革命实践的客观反映，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价值追求、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同时，它又是一种精神形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实践中形成的建党意识的凝练和升华，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集中体现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正确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本质属性，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前提，也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依据。

一、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创建实践的客观反映，集中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最终目标和行动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实践，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陷入令人无法忍受的黑暗环境、遭受罕见苦难的严酷现实的必然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习近平曾用“三个蒙”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②来描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悲惨状况。从这时起，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了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成了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使命和任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先后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1851年，历时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被评价为“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③，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初，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但最终在甲午战争的清军惨败中宣告破产。戊戌维新运动发生于1898年，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一系列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令接连发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但戊戌维新运动仅经历103天便夭折了。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④，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结局。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探索救国真理、尝试各种救国方案，但同样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⑤。无数仁人志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8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土，赍志以殁。各种救国运动、各种救国方案都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缺乏先进思想的引领，缺乏令人民信赖的政党组织。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多种救国主义、救国方案的比较中，深刻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他们经过亲身实践、慎重思考、反复推求，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实践。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于拯救民族危亡、实现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蔡和森在留法期间致信毛泽东，“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②，表示需先把“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③研究清楚。毛泽东对这些观点作出了积极回应，认为“见地极当”^④，“表示深切的赞同”^⑤。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之所以把其创建的政党组织称为“共产党”，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问题，而是蕴含着重大政治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⑥“共产党”这一名称意味的是，“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⑦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号提出了“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⑧的目标。1920年11月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阐发了共产主义者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理想，其中，在社会方面，“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⑨，并提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⑩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⑪。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根植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奋斗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⑫列宁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关于绝对自由言论的观点是一种伪善，而与之相反，社会主义者真正自由的写照则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⑬。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正是基于马列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信仰，才开始从事政党创建活动的。他们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和对社会民生各个领域的深入思考，直指病灶、擘画蓝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③} 《蔡和森文集》（上），第67页，第5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⑥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第42页。

^⑦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⑧⑩⑪}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475页，第486页，第487页，第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⑯ 《列宁全集》，第1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919年9月,毛泽东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了71项“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①的研究问题,其中包括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婚姻、家族制度问题,劳动问题等社会民生领域的代表问题。^②陈望道指出“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底(的)总枢纽”^③,认为经济问题意指“人人有劳动权,人人有生存权”^④,其“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⑤。他们依靠人民,从人民中获得力量。李大钊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⑥。李达撰写《劳工神圣颂》一文,指出劳动者“爱秩序重平和”^⑦,创造万物。邓中夏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第一个要件……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⑧。他们为了人民,矢志奋斗。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讲解文化科学知识之余,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唤醒工人“团结起来斗争”的意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济南劳动周刊》,目的是“增进劳动者的智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动者的生活”^⑨。

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的客观反映,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和特殊的政党品格。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放全人类”的行动纲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奋斗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这一实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永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核心。

首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和魂,是指引党不断前行的光辉旗帜,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新征程上,要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就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党深刻总结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指出:“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⑩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打造标识性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主要命题

^{①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2页,第362—36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④}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第1卷,第33页,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⑥}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5页,第20页。

^⑦ 《李达文集》,第1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⑧ 《邓中夏全集》(上),第77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⑨ 《王尽美文集》,第29—30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⑩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

和经典表述,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和话语体系优势。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中,以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遵循,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田沃土之中,彰显其浓厚的民族性特色。

其次,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根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就秉持的价值信仰,也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逻辑和胜利密码。新征程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共建共享创造美好世界,实现造福中国人民与造福世界人民的统一,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从国际主义的高度推动党的根本宗旨的创新发展。

最后,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正如习近平所述,“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②。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时代挑战的自觉选择。新征程上,党仍然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仍然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要继承和发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荣传统,敢于直面问题,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新的赶考路上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

二、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生革命实践的反映,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风、宗旨和最终追求,也高度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政治风貌和思想品格。

首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的集中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生动勾勒。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认为,当代需培养科学思维与信仰,他们研读并在比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是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第9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①,是未来世纪文明极大变动的“苗发”^②,彰显了二十世纪全人类普遍的价值诉求^③;十月革命的胜利,将建立自由、人道的新国家,带来新文明的曙光,引领“世界的新潮流”^④。当下的中国,即将迎来民主主义、劳工主义夺取胜利的新潮流^⑤;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⑥。他们笃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对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采取了明确的批判态度。1920年11月至1921年6月,李达先后撰写题为《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多篇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揭示社会革命的根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动,批判假社会主义者否认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唯心史观^⑦;指出无政府主义在生产组织、分配制度上的弊端,厘清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分配平等上的区别^⑧,分析无政府主义的共通要素和实行手段,对其分派学说进行逐一批驳^⑨;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三种手段,指出中国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进行革命运动的可能性^⑩。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作发言,批判“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⑪在实践中,他们笃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基于社会时势针砭时弊,认为之所以倡导“马克思社会主义”^⑫学说,是为了满足生产劳动者摆脱受压迫这一社会革新之需要;“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⑬。

其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既是对中国共产党行动纲领的集中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生动勾勒。践行初心,就是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担当使命,就是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⑭李大钊把“民族复活”“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表示需趁着世界革命、人类觉醒的曙光,“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⑮。恽代英提出“求中国的返老还童”,“求少年中国的实现”^⑯。张闻天指出,“人的中心”是“赤子之心”的体现,也是奋斗的终极意义,表示“情愿为了赤子之心”肝脑涂地,因为唯此方才“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全人类”^⑰。

再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精神的集中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的生动勾勒。不怕牺牲,指的是为了正义事业,勇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英勇斗争,指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不畏强暴、不避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从事党的创建活动,无论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都会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都要冒着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都要有不惧风险、披荆斩棘、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何孟雄作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回途中由于密探告密被捕,面对

^{①②③④⑤⑥⑯}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59页,第329页,第332页,第332页,第358—359页,第367页,第377页。

^{⑦⑧⑩}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491页,第494页,第530页。

^⑨ 《李达文集》,第1卷,第79—90页。

^⑪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页。

^{⑫⑯} 《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52页,第9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⑯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⑯ 《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⑰ 《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

敌人审讯拷打,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始终保守党、团机密,在狱中写道:“今日龙江作楚囚”,“从容莫负少年头”。^① 李大钊认为“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②,“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③。

最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集中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奉献人民的崇高情怀的生动勾勒。对党忠诚,就是对党的根本宗旨、基本纲领、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忠诚;不负人民,就是不负人民重托,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58个中共早期党员有56个是知识分子。其中,留日学生18人,北大毕业生17人,其他大学毕业8人,中师、中学毕业13人。^④ 他们投身革命,已不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小我而奋斗。“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不凡话语,体现了时年26岁的毛泽东的宏大理想和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独秀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上发表阐述中国劳动者联合与解放问题的短言,明确提出了致力于“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⑤的奋斗信条。为了人民,他们俭朴清廉、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公而忘私。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⑥ 陈独秀作为拥有优厚经济待遇的社会名流,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倾囊相助。彭湃出身于豪绅家庭,却成为中国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除妻儿外,家人大多厌其所为,但他以“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为慰藉^⑦,当众将其全部的土地契约付之一炬,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农民革命运动。

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建党实践中所体现的政治品格的概括和凝聚,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崇高信仰、价值追求、使命担当、精神风骨和道义情怀。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这一实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为榜样,锤炼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政治品格,把广大党员个体锻造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保持党员队伍活力。

第一,要在夯实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上下大功夫、硬功夫。理想信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成果转换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转换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论时代、条件和环境如何变化,都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战略定力。

第二,要在担当新时代使命、弘扬奋斗精神上下大功夫、硬功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新征程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需要我们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需要我们继续大力弘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精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以咬定青山的执着、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

^① 参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9卷,第1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 《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07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01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 参见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第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476页。

^⑥ 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9日。

^⑦ 《彭湃文集》,第1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深刻认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在深化改革、创新创造的实践中,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既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破解意识形态领域“挨骂”难题,又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破解高科技领域“卡脖子”难题,让奋斗精神在新征程中闪放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

第三,要在加强政德修养、锤炼政治品格上下大功夫、硬功夫。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在实践中养成、在修养中淬炼。正如刘少奇指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①,对于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至关重要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②,时刻守住内心,“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③,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接续奋斗中,矢志不渝地锤炼鲜明的政治品格,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意识,切实将其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三、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具有主动性和创新性, 其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是对党创建过程中 不同时期形成的精神形态的高度概括和凝练,也是对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认识把握的理论升华和智慧结晶

事物的本质或实质,是指某一对象或事物本身所必然固有的性质,是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的集中反映。把握事物的本质,是需要必要条件的。只有在事物的内在联系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充分显露出来时,认识主体才有可能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事物联系起来作出判断、进行推理,把握事物深层次的根本性质。列宁在阐述事物否定性实质时曾经指出:“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跃的(regsam)和有生机的,——才能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④充分认识把握、科学概括伟大建党精神这种精神现象,把其升华为一种内在要素丰富、内在结构严谨的精神形态,同认识任何事物的本质一样,也要经历一个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这是因为伟大建党精神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其本质的充分显露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们发挥自身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对其系统、深度的理性把握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实存的精神现象,百年前与党的创建实践融为一体地客观存在着,只有当这种精神现象的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清晰,其内在的必然性越来越彰显,人们对其根本性质的把握越来越自觉时,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伟大建党精神才能得以形成。作为精神现象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实在存在和作为理论形态的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规定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又一本质属性,即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存在,其内容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实践,其形成与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密切相连,经历了一个随着建党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历史连绵不断,精神代代相传。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非凡奋斗实践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锻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张洋:《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21年1月23日。

③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2年3月2日。

④ 《列宁全集》,第55卷,第119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实践中,培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①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培育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②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伟大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培育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③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伟大精神;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培育了“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④、“北京冬奥精神”^⑤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伟大精神。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一系列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和把握,对每一种具体精神形态的提炼和概括,为作为理论形态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⑥“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⑦。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立足高远、视野宏阔,精辟地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在党的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首创性,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增添了新篇章,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这一实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同党创建时期形成的其他精神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同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和恢宏视野来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及其弘扬和践行的规律和路径,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首先,坚持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思维,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同党创建时期形成的其他精神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历了一个从酝酿成立到完成创建的历史过程,先后形成了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等。党的创建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精神形态,如同条条水系交融汇集成伟大建党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在创建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展现的精神风貌的集中反映,是对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的概括和凝练。伟大建党精神同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是有机统一为一体的: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不能脱离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更不能因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

^{①②③④}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30 日。

^⑤ 《北京冬奥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9 日。

^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14 日。

^⑦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395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603 页。

就否定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的存在,否则,伟大建党精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流于毫无内容的形式抽象;另一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形成的红楼精神,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时期形成的石库门精神,抑或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红船精神,它们作为反映某一时期党创建实践的精神形态,都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因而都不能代替伟大建党精神。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坚持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思维,从伟大建党精神与红楼精神、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的关系中,来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质和内涵,从对红楼、石库门、红船等相关人物、事件、思想的挖掘研究中,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激励人们在新时代砥砺前行。

其次,坚持“源”与“流”的辩证思维,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①。“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的这种‘源’与‘流’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任何一种红色精神,都有伟大建党精神的血液流淌其中,都渗透着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基因,都体现着伟大建党精神的精髓要义,都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产物。伟大建党精神的这种‘源’之‘位’,决定其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所具有特殊的‘势能’和重要价值,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孵化器’或‘工作母机’”^②。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坚持“源”与“流”的辩证思维,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发展中,探索“源”“流”转化、红色血脉赓续的规律,为新时代党的伟大精神的构筑提供科学依据。

最后,坚持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思维,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百年前党的创建时期,弘扬于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彰显了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③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④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意味着新征程的伟大实践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强烈呼唤。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思维,把伟大建党精神同习近平关于党的伟大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的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有助于我党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有助于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以新的精神伟力描绘新的伟大图景,以新的伟大胜利铸就新的精神丰碑。

作者:吴潜涛,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北京市,100084)

沈茹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084)

(责任编辑:阳军)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8 页。

② 康松乔:《如何永远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潜涛访谈录》,《秦皇岛日报》,2021 年 8 月 12 日。

③ 习近平:《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求是》,2021 年第 17 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2 页,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